

S I S H U J I N G W E I

四书经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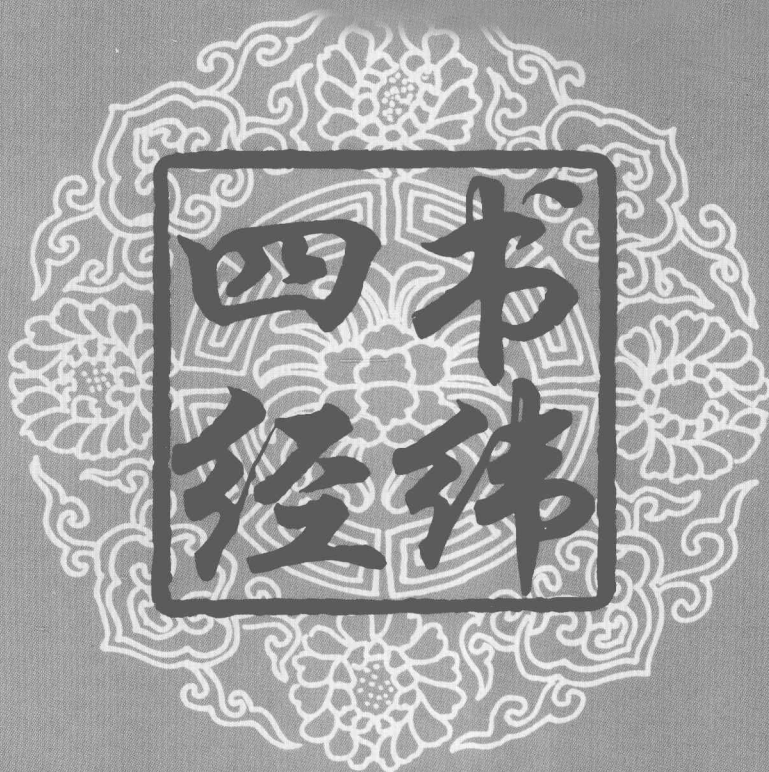
郭穆庸◎主编

四书者：儒家《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书

经纬者：儒家理学、心学两大流派者也，将其纵横穿梭评述，遂成《四书经纬》一书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书经纬 / 郭穆庸主编.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108-0676-6

I. ①四… II. ①郭… III. ①四书—研究
IV. ①B222.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5290号

四书经纬

作 者	郭穆庸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 com
印 刷	北京大地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95
字 数	2300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 第1版
印 次	2010年10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676-6
定 价	390. 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

故曰：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生雷电，阴成雪霜，养育群生，一茂一亡，润之以风雨，曝之以日光，温之以节气，降之以陨霜，位之以众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罗之以纪纲，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祲祥，动之以生杀，悟之以文章。

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

故地封五岳，画四渎，规湾泽，通水泉，树物养类，苞植万根，暴形养精，以立群生，不违天时，不夺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诈。

故知天者仰观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蜎飞蠕动之类，水生陆行，根着叶长之属，为宁其心，而安其性，盖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而成者也。

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

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谷。

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

民知室居食谷，而未知功力，于是后稷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枲，以蔽形体。

当斯之时，四渎未通，洪水为害；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

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

铄金镂木，分苞烧殖，以备器械。于是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县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

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具清洁之行。

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

后世淫邪，增之以郑卫之音，民弃本趋末，技巧横出，用意各殊，则加雕文刻镂，傅致胶漆丹青、玄黄琦玮之色，以穷耳目之好，极工匠之巧。

夫驴骡、骆驼、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翡翠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洁清明朗，润泽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气所生，神灵所治。幽闲清净，与神

浮沉，莫之不效力为用，尽情为器。故曰，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也。

《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若乃孔孟之道，绵延五千年，圣人贤儒，千秋令景仰。昭彰礼义廉耻，肇基国本；明德仁义礼智信，正义君亲。越今烛照绵延已五千余年矣。

今乃中华民族伟大勃兴之日，修复文物以求发扬光大之举，此则天地人和融聚为一炉之时，兴甚至哉，鉴古察今，精思力践，毅然以圣人之事为己任，自周张程朱陆王诸先贤已降，对于旧日经书元典重做新注解，所以使孔孟之道之面目，因新注解而一新，前人所未发现者，更因新注而发现之。以宋明理学为经，以陆王心学为纬，经纬穿梭，遂成《四书经纬》一书，以期赓续国学，振旅儒宗，提撕中华文化，使能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大和稀声。诚如《周易》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宋代大儒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秉承这一宗旨，郑州嵩山书院网络文化教育传媒特成立专门编委会，编辑出版《四书经纬》一书。该书顺次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篇，下按章节目录排序。

各一章节目录均按元典、译文、诸儒注疏、理学讲评、心学讲评、心理穿梭展开。

“元典”之下是“译文”，“译文”则可作为读者串解原文的参考，而译文或直译或意译，视情况而定，不强求一律；“诸儒注疏”是历代大儒对元典句读的理解；“理学讲评”是历代周、张、程、朱等理学一派大儒对四书元典的理解或释意；“心学讲评”则是陆、王心学大儒对四书元典的理解和释意；“心理穿梭”是对理心两派做一评述，以启后来学者能够超越前代，为元典作出符合时代特征的解释。苏格拉底说：“一个人不能同时踏进一条河流。”那么编者也说，作为我们每一个读者或学者亦不能站在历代大儒对元典的理解上而滞步不前，而应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砥砺中创新发展复兴中华儒学，小而言之，儒学幸甚；大而言之，中华民族兴甚。

在编辑该书过程中，我们引用和吸纳了许多儒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恕不一一注明，唐突之处，敬请谅解。

编辑这本书，对我们全体编辑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挑战和历练，同时也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书中难免有不妥乃至谬误之处，敬请不赐惠教，可通过嵩山书院网络信箱给予指导，以利下次出版纠正，在此先行谢过。

(序一) 提振儒家文化精神

日益崛起的中国，堪称不凡。60 年困难与危机成就中国砥砺向前的茁壮身影，无数闪光的时刻串联起一个丰满的伟大复兴的中国，使得整个世界对中国不约而同地欢呼惊叹：“崛起的中国无处不在！”从让世界听懂中国声音，到向世界表达中国立场；从中国拥抱世界，到世界为中国喝彩——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不仅来自“硬实力”的提升，而且更来自“软实力”的自信。在这种意义上，“软实力”其实是一个硬资源，一个硬指标，一种真气概，一种真期待。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在我国历史上虽说是由儒、道、释三家构成中华文化，但儒学却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从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的形势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源头，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将对有力地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作为中国新儒家知识分子，在深入研究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更加关注和有较深地研究。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文化必须在传承中更新，这样中国文化才得以真正的“复兴”，而“重新燃起新的火焰”。我国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这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十分重要，它会对人类社会健康合理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和谐”是儒学的中心观念，在我国传统儒学中包含着“和谐社会”的理想以及可以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大量的有意义的思想资源。《礼记》中的“大国”思想可以说为中华民族勾画出一幅“和谐社会”的蓝图。《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和谐”将会对调节人们社会生活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而“和而不同”又可以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和平共处”提供了理论依据。特别是《周易》中的“太和”观念经过历代儒学思想家的发挥，已具有“普世和谐”的意义，这就是说，“和谐”应该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等诸多方面的“和谐”，才可以称为“普世和谐”。所以王夫之说“太和”是“和之至”，“太和”是最完美的“和谐”，如此等等，在儒家思想中比比皆是。

我国在 21 世纪初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想。这是我国的领导人和广大学术界有见于当今世界正处在一大转折关头之时的英明之举。我们看到：近两百多年来，由于对自然界无限的开发，残酷的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由于人们片面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权力欲望的无限的膨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残酷的战争。由于过分注重金钱的感官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类分裂，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已成为一种社会病。因此，当前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甚至今后还要长期不断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或者说“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以及“人自我身心”之间的种

种矛盾问题，这些无疑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课题，针对上面说到的三大矛盾，我们认为，儒学可以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某些有益的思想资源。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思想可以无疑为解决上述三大矛盾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智慧。

儒家的“天人合一”（合天人）的观念将会为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郭店楚简·语丛一》中说：“易，所以合天道人道也。”这是说，《周易》是一部会通“天道”、“人道”所以然道理的书，也就是说它是一部讲“天人合一”的书。对于如何了解“天人合一”思想，朱熹有段话很重要，他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人初产生时，虽然得之于天，但是一旦有人，“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即“人”对“天”就有了责任。“天人合一”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思维模式，它要求人们不能把“人”看成是和“天”对立的，这是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就要受到惩罚。因此，“天人合一”学说认为，“知天”（认识自然，以便合理地利用自然）和“畏天”（对“自然”应有所敬畏，要把保护自然作为一种神圣的责任）是统一的。“知天”而不“畏天”，就会把“天”看成一死物，不了解“天”乃是有机生生不息的刚健大流行，“畏天”而不“知天”，就会把“天”看成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而使人不能真正得到“天”（自然）的恩惠。所以“天人合一”思想要求“人”应担当起合理利用自然，又负责任地保护自然的使命。“天人合一”这种思维模式和理念应该说可以为解决当前“生态危机”提供某些有意义的资源。

“人我合一”（同人我）的观念将会为解决“人与人（社会）”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人我合一”是说在“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为什么“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道始于情。”人世间的道理（人道）是由情感开始的，这正是孔子“仁学”的出发点。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这种爱人的品质由何而来呢？《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品德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孔子的儒家认为“仁爱”不能停留在只是爱自己的亲人，而应该由“亲亲”扩大到“仁民”以及“爱物”。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把爱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爱”扩大到对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爱，那么世界不就可以和平了吗？把“亲亲”扩大到“仁民”，就是要行“仁政”。我想，我们今天要建设“和谐社会”，首要之事就是要使我们的老百姓都有自己的固定的产业，爱老百姓要像爱自己的父母、亲人一样。就全人类说，就是要使各国、各民族都能自主地拥有其应有的资源和财富，强国不能掠夺别国的资源和财富以推行强权政治。所以“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爱护和相互尊重的“人我合一”思想对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应是有重要意义的。

“身心合一”（一内外）将会为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身心合一”是说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和谐关系。儒家认为达到“身心合一”要靠“修身”。《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闻道反己，修身者也。”意思是说，知道了做人的道理，就应该反求诸己，这就是“修身”。所以《大学》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如果一个社会有了良好的制度，再加以有道德修

养的人来管理这个社会，社会上的人都能“以修身为本”，那么这个社会也许就可以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世界就可以成为一个“和谐的世界”了。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儒家四书典籍，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卓越结晶，其中包含了圣贤的经世济民之道，人伦五常之理，求学修身之方。《论语》是孔子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书中告诫我们要注重道德修养，学习要端正态度，讲究方法；《孟子》阐述了儒家的道德仁义；《中庸》中的“中”是中正、中和，要求处理事情没有过头与不及的缺欠，“庸”是常行不变的道理；《大学》论述是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我们生活在今天，要了解自古以来治乱兴衰的道理，把它作一面镜子，但是古今不一定都相同，需要以我们的智慧在传承前人有价值的思想中不断创新。君子力挽江河，节士光争日月，以人为镜吉凶可鉴，小河不察亦可覆舟。我们要吸取古书中的精华，学习古代圣贤人养德、修身、治国、处世的良方，并付诸实践，就可避免自己的言行出差错，争取做一个为人称颂的“完人”。

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今人类社会遇到的问题，儒学可以为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善于利用儒学资源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也可以说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机会。诚如是，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孔子的儒家思想并不十全十美的，它并不能全盘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诸多复杂问题，它只能给我们提供思考的路子和有价值的理念（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的理念），启发我们用儒学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智慧，《四书经纬》便是在给这些圣贤思想资源之上，作出以适应现代社会和人类发展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诠释和评论，力争为建设和谐的人类社会作出新贡献。

是为序也。

(序二) 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发达国家在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在实行开放政策的同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坚持弘扬自己的民族精神，通过对民族精神文化的诠释，形成日本的“大和意识”、美国的“美利坚精神”、德国的“日耳曼精神”以及法国的“法兰西精神”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这些精神使这些民族的内部凝聚力得以空前的发挥，从而有效地促进了这些民族较早地实现了现代化。

实践证明：民族精神和现代化，不是对立的两极，二者之间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和鲜明个性的民族，她在既往的历史上曾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依着中华民族的固有本性和社会运动规律，如果没有19世纪中叶之后的那些突发事件，中华民族应该能以坦然的心态步入现代社会，从而自觉完成现代化的转变。

我们看到，在近现代中国，一些具有紧迫感和焦灼情绪的青年，出于对祖国命运与前途的强烈忧虑和关切，每每将中国迟迟不进步的罪责归结于民族传统文化，激进者甚至以为只有彻底丢弃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引进现代观念，才能真正拯中华民族，这种观念虽然本质上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但实际上则陷入一种理论误区。

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在谈到怎样才能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怎样才能使中国完成现代化的转化时讲过一番令人深思的话。他说：“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像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中的独强。我们祖宗从前已经达到了那个地位，说到现在还不如殖民地，为什么从前的地位有那么高，到了现在便一落千丈呢？此中最大的原因，我从前已经讲过了，就是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

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中国今天所面对的国内外情况已和中山先生当年所处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但当我们真正面对世界的时候，我们便会发现中山先生对我们民族的期望并没有完全实现，中国不仅没有恢复到往昔世界中头一个强国的地位，而且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山先生的遗训并没有过时，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要先恢复民族精神。以中华民族的固有精神唤起全民族的觉醒，举国努力，众志成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能得以真正恢复。

既然恢复民族精神是国家强盛的必由之路，那么我们当然首先应当明了民族精神特别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确切内容。所谓民族精神，就是一个民族在其成员身上留下的“胎记”，是在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层面的历史积淀，它不会因其成员地域的迁徙、国别的不同而改变，它既是一个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又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性标识。

作为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必定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基本精神，就是以儒家为主导的基本精神，它是中华民族

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是维系中华民族统一、自立、自强、进取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得以立国的内在依据。

循此原则，我们便不难看出我们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根本区别何在，也不难明了我们今天应当恢复的民族精神究竟是什么。孙中山先生当年谈到这个问题时提到两条原则，一是应该恢复“我们旧有的道德”，一是应该恢复我们“固有的智能”。现在想来，这两条原则依然具有启迪意义。

讲到中国旧有道德，当此西方观念横冲中国的今天，似有不适时宜的守旧之嫌。其实，当我们冷静的思考时，我们便不得不承认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中国固有的道德并不仅仅是我们祖先的创造，而且是其他民族同样向往的美好理想，这些道德观念也有其永恒的价值。因此，中山先生强调，“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恢复不等于照旧，恢复应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旧的道德观念进行现代观照与诠释，赋予时代气息。以“忠孝”而言，这是五四及其以后最受人们责难的价值观念。但平心而论，我们既然不能提倡“不忠不孝”的反命题，何不对“忠孝”观念进行现代诠释，以确立和完善现代国人的价值体系？而且，“忠”的对象在中国古代固然包括君主，但忠于君主并不是忠的全部内容。何况中国古人在践履“忠”的观念时，并没有忘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原则呢？因此，中国旧道德的忠的观念与现代社会并不冲突。只是忠的对象在撇开了君主个人之后更加单一，那就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如果我们人民政权中的所有公仆都能做到这些，那么人民的情绪怎能还会不舒畅呢？哪里还要什么“活血化瘀”呢？

恢复中国旧有的道德，是恢复民族精神的应有之义，但兹事体大，关涉甚广，决非本文所能详论。我们的意思只是提醒国人，“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至于恢复中国固有的“智能”或称“知识”，也是恢复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通常所谓灿烂的中华文明，其实就是说中国人已经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严密、深邃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就是《大学》中所概括的“三纲领、八条目”，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的基本要求是生命个体在社会基本架构下充分发挥主体自我意识和能功性，以自我为轴心，从个体的意念开始向外扩展，经过若干过程与环节，最终达到平天下的目的。

从理论上说，中国这一独特的知识体系并不排斥对科技的追求与物质的创造。当然必须承认在中国固有的知识结构中缺少现代西方的科技与文化。问题是中国固有知识体系是否足以容纳和吸收西方科技与文化？明清以来的中西交流已经对此作了肯定性的回答。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虽带有浓郁的道德本位主义色彩，但它所讲的实在是知识范围内的事。我们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知识的追求或许有方向性的错误，但他们总是将知识与做人紧密结合起来，将治国、平天下作为向外的追求。以正心、诚意、修身作为向内的功夫。如同我们对中国固有道德无法提出反命题一样，当我们倡导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的时候，也完全应当对中国固有的智能进行现代诠释，

完成现代化的转换。从而使我们的民族精神真正得以发扬光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四书经纬》便应运而生。

是为序也。

(序三) 品四书精髓正道德情操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道德根基和重要精神支柱。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重德行、贵礼仪，在世界上素来享有盛誉。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儒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从口头传承到文字记载，内容博大而精深。但归纳起来，历史典籍里加以明确、历代历朝基本形成共识的内容主要是“仁、义、礼、智、信”五个要素。当然，在传统文化道德方面还有很多表述，但大部分都包含在这五大要素中，或者是这五大要素的延伸，或者是这五大要素的丰富，或者是这五大要素的发展。五大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大厦的根基和支柱。“仁、义、礼、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理念 and 基本要求，是我们要很好遵循的最重要的五种社会道德规范；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各种组合的比较来看，“仁、义、礼、智、信”是人们应该履行的基本义务和主要品行，在道德建设中具有基础地位；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仁、义、礼、智、信”在中华民族道德建设的长河中具有本源地位；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林林总总、丰富多彩的庞大体系来看，“仁、义、礼、智、信”具有主导地位；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对社会进步所产生的广泛性、深远性影响来看，“仁、义、礼、智、信”带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发展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在整个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具有重要地位。

孙中山先生还提出要推行“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新的道德理念，认为人无道德便不能革命，人不具备好人格便不能够造就一个好国家。因此，他认为革命党人要具备“不求做大官，只求做大事”的优良的品格，足见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对推进社会变革的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传承文明，开拓未来，用自己特有的世界看待历史，观察现实，展望未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提出对古代思想文化要批判地继承。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要继承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建立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胡锦涛总书记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相结合，提出了要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些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员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正确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

但是，不可否认，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过程和中国文明面对世界之际，不仅会遭遇文化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的分立与分离问题，而且还会不断出现诸如大传统与小传统、心灵与实践、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背逆等等中国式难题。换言之，文化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浮现于当今中国的问题视域，秉持普世价值的同时恪守文化身份，拥抱

政治理想之际对于人性永怀怵惕，坚守公民理想与捍卫民族理想的统一，不仅对固有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认、传承和归依。并在此基础上善于创造性阐释含弘光大，同时表现为对于自身文化身份在世界文明图景中的自我肯定，也意味着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人与思想者对于提撕中国文明境界的期待和担当，逼迫着我们必须做出当下中国的回应。

其一，对于传统“天下观”予以现代重构性阐释，以天下观念的博大与包容，吸纳一切人类文明，重塑世界格局。以晚近中国一百多年所积累的生存经验为背景来重构世界格局的努力，既是对“天下观”的拓展，可能也是向美美与共的人类家园理想提供中国文化启示的用力处。

其二，对于“中国精神”的文化合法性阐释与“文化中国”图景的建构。对于“中国”意涵的不断阐释，也是对中国之为一种人间秩序和人世生活的应然之维的绵绵不绝的开拓、提升和丰富的过程。由此造成的历史与道义、知识与思想、形上与形下、天道与人心的廓然意象，一以仁爱宽和、厚道中庸、博大中正和进取向上为依归，文质彬彬，坚毅刚卓，此其为中华也。这是“中国形象”文化合法性的必要内涵，更是面临全球化时代，文化与制度竞争形势下，中国知识思想界应予传承接续的未尽伟业。

其三，建构中国文明的超越本体，提高中国文明的精神层次。在此，需要挖掘中国文明的人文主义心性资源及其超越禀性，包括“以德抗位”的道德主体性，仁义礼智信的价值信念和精神追求，形成中国的自然法理论体系，剥夺世俗权力天然合法性的独断论述，形成“有法有天”的人间秩序，提炼超越意义的汉语学思。

其四，对于中国伦理智慧、道德理想的发掘和道义力量的涵养，大凡引领世界人类方向的国族，多半具有自己的浩然道德理想与铮铮道德担当，秉有深厚的伦理智慧，而提炼出普世的价值理念。平等、自由和博爱理念，既是政治理想，也是道德理想，两三百年来一直是响遏行云、鼓荡人心的最为美好的道德号令，一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一千年心声，具有永恒的感召力。秉持如此道德情怀的国家，才是受人尊重的泱泱国度。一句话，中华文化的“复兴”，特别是软实力部分，尚需知识思想界的重构性阐释。

一个人一生可能不成功，但一个人一生不可能不成长。温家宝总理说：“一个民族有些仰望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国民的阅读趣味，一个政权的视野远见在于官员阅读水平。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品味，也决定一个民族的素质，影响一个国家的走向。《四书经纬》正是这样一部中华道德情操修养书，并是一部值得阅读和陪伴终身的精神食粮。

是为序也。

目 录

绪 论	1
大学 大学之道	5
大学 克明德	15
大学 释明明德	18
大学 邦畿千里	21
大学 知本	28
大学 修身	33
大学 治国	42
论语 学而篇	68
论语 为政篇	91
论语 八佾篇	121
论语 里仁篇	150
论语 公冶长篇	181
论语 雍也篇	212
论语 述而篇	250
论语 泰伯篇	286
论语 子罕篇	313
论语 乡党篇	344
论语 先进篇	364
论语 颜渊篇	395
论语 子路篇	432
论语 宪问篇	463
论语 卫灵公篇	508
论语 季氏篇	547
论语 阳货篇	572
论语 微子篇	602

论语	子张篇	616
论语	尧曰篇	640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上	649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下	691
孟子	公孙丑章句上	739
孟子	公孙丑章句下	795
孟子	滕文公章句上	835
孟子	滕文公章句下	881
孟子	离娄章句上	919
孟子	离娄章句下	980
孟子	万章章句上	1037
孟子	万章章句下	1080
孟子	告子章句上	1123
孟子	告子章句下	1188
孟子	尽心章句上	1234
孟子	尽心章句下	1300
中庸	天命性道教	1353
中庸	君子中庸	1360
中庸	中庸其至	1363
中庸	道之不行一	1365
中庸	道之不行二	1367
中庸	舜其大知	1368
中庸	人皆曰予知	1370
中庸	回之为人	1372
中庸	天下可均	1374
中庸	子路问强	1377
中庸	素隐行怪	1380
中庸	费而隐	1383
中庸	道不远人	1388
中庸	君子素其位	1394
中庸	行远自迩	1398

目 录

中庸	鬼神之德	1400
中庸	舜其大孝	1404
中庸	文者无忧	1408
中庸	武王达孝	1412
中庸	哀公问政	1418
中庸	自诚明	1442
中庸	唯天下至诚	1445
中庸	其次致曲	1448
中庸	至诚之道	1451
中庸	诚者自诚	1454
中庸	至诚无息	1459
中庸	圣人之道	1466
中庸	愚而自用	1472
中庸	王天下有三重	1476
中庸	祖述尧舜	1481
中庸	唯天下至圣	1485
中庸	唯天下至诚	1489
中庸	衣锦尚絅	1494

绪 论

缘“德”上著一“明”字，所以朱子直指为心。但此所谓心，包含极大，托体最先，与“正心”心字固别。性是二气五行妙合凝结以生底物事，此则合得停匀，结得清爽，终留不失，使人别于物之蒙昧者也。德者有得之谓，人得之以为人也。由有此明德，故知有其可致而致之，意有其不可欺而必诚焉，心有所取正以为正，而其所著，发于四肢，见于事业者，则身修以应家国天下矣。明德唯人有之，则已专属之人。属之人，则不可复名为性。性者，天人授受之总名也。故朱子直以为心。而以其所自得者则亦性也，故又举张子“统性情”之言以明之。乃既以应万事，则兼乎情，上统性而不纯乎性矣。

性自不可拘蔽。尽人拘蔽他，终奈他不何，有时还迸露出来。如乍见孺子入井等。即不迸露，其理不失。既不可拘蔽，则亦不可加以明之之功。心便扣定在一人身上，受拘之故。又会敷施翕受，受蔽之故。所以气禀得以拘之，物欲得以蔽之，而格、致、诚、正亦可施功以复其明矣。

朱子“心属火”之说，单举一脏，与肝脾肺肾分治者，其亦泥矣。此处说心，则五脏五官，四肢百骸，一切“虚灵不昧”底都在里面。如手能持等。“虚”者，本未有私欲之谓也。不可云如处空。“灵”者，曲折洞达而咸善也。《尚书》灵字，只作善解，孟子所言仁术，此也，不可作机警训。“不昧”有初终、表里二义：初之所得，终不昧之；于表有得，里亦不昧。不可云常惺惺。只此三义，“明”字之旨已尽，切不可光训“明”。

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明自明，光自光。如镜明而无光，火光而不明，内景外景之别也。“明德”只是体上明，到“致知”知字上，则渐由体达用，有光义矣。

“旧染之污”有二义，而暴君之风化、末世之习俗不与焉。大学之道，初不为承乱之君师言也。一则民自少至长，不承德教，只索性流人污下去。一则人之为善，须是日迁，若偶行一善，自恃为善人，则不但其余皆恶，即此一善，已挟之而成骄陵。故传云“日新”，云“作新”，皆有更进、重新之意。

新安引《书》“旧染污俗，咸与惟新”以释此，则是过泥出处而成滞累。如汤之自铭“日新”也，岂亦染桀之污俗乎？况《书》云“咸与惟新”，只是除前不究意，与此何干？

“必至于是”是未得求得，“不迁”是已得勿失。“止于至善”须一气读下，归重“至善”一“至”字。言必到至善地位，方是归宿，而既到至善地位，不可退转也。朱子以“不能守”反“不迁”，最为明切。此中原无太过，只有不及。《语录》中作无太过不及说，自不如《章句》之当。盖既云至善，则终无有能过之者也。

或疑明德固无太过之虑，若新民，安得不以过为防？假令要民为善，教格过密，立法过峻，岂非太过？然使但向事迹上论，则明德亦将有之。如去私欲而至于绝婚宦，